

2018

年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超越『传统、现代』认知框架的话语实践
——赛珍珠的『乡土中国』书写再解读

张莹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年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超越『传统、现代』认知框架的话语实践
——赛珍珠的『乡土中国』书写再解读

张莹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越“传统 / 现代”认知框架的话语实践：赛珍珠的
“乡土中国”书写再解读 / 张莹著. — 哈尔滨：黑龙
江大学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1
ISBN 978-7-5686-0313-3

I. ①超… II. ①张… III. ①赛珍珠 (Buck, Pearl
1892-1973) — 文学研究 IV. ① I712.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4264 号

超越“传统 / 现代”认知框架的话语实践——赛珍珠的“乡土中国”书写
再解读

CHAOYUE “CHUANTONG/XIANDAI” RENZHI KUANGJIA DE HUAYU SHIJIAN——SAIZHENZHU DE
“XIANGTU ZHONGGUO” SHUXIE ZAIJIEDU

张 莹 著

责任编辑 马 媛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三道街 36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79 千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86-0313-3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赛珍珠对“乡土中国”风俗的再发现	27
第一节 西方现代性话语对中国风俗的“他者化” 建构	27
第二节 赛珍珠对包办婚姻等风俗的理解	34
第三节 赛珍珠对乡土习俗中“礼物的精神”的 发现	40
第四节 赛珍珠对中国民间宗教功能的认知	50
小 结	68
第二章 赛珍珠对“国民性”话语的颠覆	70
第一节 “国民性”话语的生成及其对中国知识界的 影响	70
第二节 赛珍珠对乡村社会生存理性的呈现	83
第三节 赛珍珠对农民反抗方式的发掘	97

第四节 赛珍珠对家族重要功能的阐扬	110
小 结	123
第三章 赛珍珠对“女权主义”话语的超越	124
第一节 “女权主义”话语在中国的发生	124
第二节 赛珍珠对传统乡村女性价值的确认	132
第三节 赛珍珠对女性解放问题的反思	143
第四节 赛珍珠对现代女性生存困境的揭示	157
小 结	165
结 语	167
参考文献	172
附 录	181



导 论

一、讲述中国故事的赛珍珠

在 20 世纪美国作家中,赛珍珠是与中国渊源最深的一位。赛珍珠本名珀尔·康福德·赛登斯特里克(Pearl Comfort Sydenstricker),1892 年 6 月 26 日出生于美国的西弗吉尼亚州,赛珍珠是她后来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字。从三个月大的时候开始,赛珍珠就跟随身为美国长老会驻中国传教士的父母来到中国,直到 1934 年才回到美国定居,赛珍珠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度过了她前半生大部分的时光。

赛珍珠从小就生活于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中间,她通晓汉语,并且自幼跟随家教孔先生研读四书五经等中国古典文学与历史著作。1910—1914 年,赛珍珠就读于美国的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即返回中国,并于 1917 年与约翰·洛辛·布克(John Lossing Buck)结婚,改名为 Pearl S. Buck(中文译为珀尔·布克)。婚后,夫妇二人在安徽北部的宿县(今宿州市)农村生活了五年^①。这期间,赛珍珠深入到中国的普通农民之中,开始关注并研究农民的生产方式、生存环境和文化习俗,这为其日后的“乡土中国”书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1 年秋,赛珍珠跟随布克来到南京,在隶属美国教会的金陵大学(Nanking University)教授英文。在南京的这

^① 对于布克夫妇到底在宿县生活了几年,一直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以学者刘海平、刘龙和彼德·康为代表,认为二人在宿县共生活了两年半;另一种以姚君伟、姚锡佩、宋安群等人代表,认为二人实际在宿县生活的时间是五年。学者魏群通过考证认为,布克在宿县生活的时间是五年,而赛珍珠在宿县生活的确切时间应为两年半。(魏群,2009:137—141)笔者在此采信后一种观点。

段教书经历,使赛珍珠接触到了大量的中国知识界精英,也使她切身体会到了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同农民阶层的疏离。1934年,赛珍珠与布克因性格不合离婚,随后嫁给她的出版商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Walsh),并在美国定居。尽管此后由于种种原因赛珍珠一直未能再次踏足中国的土地,但她依然满怀对中国的深情,把东西方交流作为志业:她主持过旨在向西方社会介绍亚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的《亚洲》(*Asia*)杂志;她和沃尔什创办了致力于亚洲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与理解的“东西方联合会”(East and West Association);她呼吁种族和性别平等,帮助废除《排华法案》;在日本侵华期间,她积极为中国抗战募集善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她还创立了国际化的收养机构“欢迎之家”(Welcome House),安置来自世界各地的被弃养的儿童……1973年3月6日早晨,赛珍珠在美国佛蒙特的家中病逝,享年81岁,按其遗愿,她的墓碑上只镌刻了“赛珍珠”三个字。

赛珍珠深谙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她儿时就像一个普通的中国孩子一样,说中国话,吃中国家常菜,穿中国布料做成的衣服,玩伴是普通的中国小孩儿,玩的游戏也是纯中国式的。因此,她眼中的中国与中国人是那样真实与自然,不带半点偏见,也非凭空想象:“当我被问及他们是怎样的人时,我无法回答。他们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就只是人而已。我谈论他们跟谈论我的亲人一样。我和他们太亲近了,我已经以全副身心投入了他们的生活。”(赛珍珠,1992b: 3)“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始终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赛珍珠,1992a: 63)儿时的经历使赛珍珠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也使她能够更真切地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而对于中国古典作品的喜爱也使她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文学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中国”也就毫无意外地成为她作品中的第一关键词。早在美国读大学时,赛珍珠就开始了有关中国题材的写作尝试,论文《中国与西洋》为她赢得康奈尔大学奖额最高的研究生奖学金,毕业论文《论西方对中国生活与文明的影响》又使她顺利获得硕士学位。在她一生创作的上百部作品中,一大半都是以中国为题材的——正是凭借这些作品,她一举获得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甚至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她也

是以“中国小说”为题目,在世界文学最高的讲坛上表达她对中国的热爱。

在赛珍珠的中国题材作品——尤其是《大地》——出版之前,西方世界以中国或中国人为背景的小说数量稀少且论调多是千篇一律:若是讲建筑铁路的华工,开场多是这样描述,一个中国人“坐在铁路旁,一位白人走过来”,将他的辫子剪掉,“若写中国女人,裹小脚,既可怜,又可憎;写男人则是唐山来的,脏兮兮,迷信拜神,沟渠边赌扑克牌……”(黄文湘,1995: 62)直到赛珍珠的作品面世,这一状况才得到明显改变。可以说,赛珍珠是第一位修正了中国人形象的美国作家。“她为一整代的美国人‘制造’了中国人,就像狄更斯为我们许多人‘创造’出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贫民窟中的人们那样。”(哈罗德·伊萨克斯,1999: 212)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指出,赛珍珠是“自13世纪马可·波罗以来描写中国的最有影响的西方作家”(彼德·康,1998: 前言5)。史景迁、费正清、韩德、哈罗德·伊萨克斯等美国著名汉学家也都曾在各自的论著中提到过赛珍珠的《大地》以及这部小说对西方中国观的巨大影响。1931年秋,中国遭遇了严重的水灾,其时正当《大地》风靡美国,主人公王龙一家因遭受严重旱灾而流离失所的故事深深打动了美国人,因此,美国民众对中国异常同情,听闻中国遇灾,积极为中国灾民进行募捐,所捐款的数额也占到了当时中国政府收到的所有国外捐款的大部分。(胡仲持,1999: 28)赛珍珠的中国题材作品也对很多美国少数族裔女性作家,如美国著名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1992年召开的赛珍珠百年诞辰国际研讨会上,汤亭亭由衷地表达了对赛珍珠的敬意,她认为赛珍珠在西方文学史上第一次让人们听到亚洲的声音,赛珍珠“以移情手法和同情之心塑造了一批中国人物形象”,“为我解释了我自己的父母”,并“向我展示了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生存环境”(彼德·康,1998: 前言4—5)。另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也曾提到过在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儿的时候,就阅读过赛珍珠的小说,并亲切地用反语说:“她误导了我,使我以为所有作家都是以同情、有力、诚实和坦率的态度来描写其他文化的。”(彼德·

康,1998:前言5)

赛珍珠一生传奇的经历使她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她虽然是一位严肃的作家,但是她的小说又通俗得妇孺皆知,且拥有海内外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她虽然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是她的小说又备受主流文学批评界的冷落与诟病;她虽然一生致力于捍卫人权及种族平等的人道主义活动并进入到麦卡锡的反美黑名单,但是她又是新中国成立后备受批判的“帝国主义卫道士”,至死也没能获准再次回到她视为第二祖国的中国;她虽然是具有前瞻眼光的开明思想家,是女权主义运动的拓荒者,但是她同时又是传统价值与道德规范的拥趸……1938年,赛珍珠在一片争议声中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曾有人认为她的获奖完全是拜当时的政治局势与环境所赐,因为她的中国题材作品正好可以在二战反法西斯的背景下使人们广泛关注中国这一备受蹂躏的民族,从而有助于印证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尽管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我们尚难下断语,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赛珍珠是第一位因为书写中国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而且是一位美国人。

正是因为赛珍珠的中国书写所获得的成功,才使得全世界的目光汇集到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才使得中国以正面的姿态走入了西方文学视界,才使得全世界的读者有可能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以及中国人。赛珍珠对中国的那种同情、友善、尊重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者简单的“传统/现代”二元认知框架,超越了那种把中国置于“他者”位置上的东方主义想象,恢复了中国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美国人,乃至整个西方世界。

二、国内外对赛珍珠的接受与研究述评

(一) 国外对赛珍珠的接受与研究述评

尽管赛珍珠在长达40余年的写作生涯中出版了上百部作品,且作品被翻译成145种语言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尽管赛珍珠问鼎了普利策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两项大奖,且是美国首位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但相对于其他的西方著名作家而言,国外学界关于赛珍珠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

实在是少得可怜,有限的研究著作也大多为传记,这种状况显然是与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身份不相称的。

综观国外有限的相关研究文献,其中不乏对赛珍珠的赞誉之声。

其一是对赛珍珠艺术表现力的赞誉。在《东风·西风》发表后,美国的《太平洋时事》(*Pacific Affairs*)杂志就刊登了署名 E. G. 的评论,称这部作品为“一部真正的戏剧杰作——宁静、有力且动人心魄”,“西方人如果不读它,就失去了一把了解东方的最可靠的钥匙”(1930: 506)。三年之后,当赛珍珠的《儿子们》出版后,E. G. 又撰文评价此书继承了《大地》的流畅风格,是“一部优美的散文”,“它以毋庸置疑的艺术手法,使读者置身于熟悉及不熟悉的场景和事件之中,又以一个强有力的音符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一个情感的悬念”(1933: 112—115)。

美国学者菲莉斯·本特利(Phyllis Bentley)在1935年发表了《赛珍珠的艺术》一文,在分析了赛珍珠小说中的主题选择、情节安排、场景设置、人物性格和行文风格等元素之后,本特利敏锐地观察到了赛珍珠的作品具有一种平铺直叙的“圣经体”风格,这种文体“庄严、恬静”,“赛珍珠甚至无须提高调门也能表达出最深沉和最轻松的感情”。(Bentley, 1935: 791—800)亚历山大·考伊(Alexander Cowie)认为这种“圣经体”风格作为显著的语言特征经常出现在现代家族小说中,而赛珍珠的《大地》“也许是所有家族小说中最通俗的”。他还指出这种写作风格“旨在使读者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而不是对生活做细致全面的解读”。(1948: 751)

世界出版公司的编辑卡尔·凡·多伦(Carl Van Doren)这样评价《大地》:“流畅的行文、简洁明快的语言风格,宛如一首人类传奇的现实主义的田园史诗”,“同中国传统小说的风格极为相似”。(1970: 353)亚历山大·布里德(Alexander Brede)也在1942年出版的《龙子》的书评中对赛珍珠的小说创作技巧大加赞赏,认为“赛珍珠深谙激发好奇与制造悬念之道,以客观、简明、具体、栩栩如生的表现手法,呈现了虽饱受战争磨难但仍坚强不屈的中国人的形象”(1942: 390)。《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著名专栏作家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也给予《大地》极高的评价,称这部小

说“不仅仅是描写一个民族的最伟大的作品,同时也是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小说”(1977: 311)。

其二是对赛珍珠所呈现的中国形象的赞誉。赛珍珠一生中最受欢迎与肯定的作品还是那部“对中国农民生活丰富的、真正史诗性的描写”^①的《大地》。《大地》出版后,评论界高度赞扬了该书在塑造一个全新的、“真实的”、“普通的”中国形象方面的贡献,认为赛珍珠在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丰富饱满、充满人性,大大突破了以往“东方主义”式的刻板人物形象。《纽约时报》评论道:“赛珍珠再现了不带任何神秘色彩和异国情调的中国,可喜可贺。书中找不出我们通常称之为‘东方式’的特征。”(彼德·康,1998: 143)同样在中国居住过多年的弗洛伦斯·艾斯库格(Florence Ayscough)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中这样评价赛珍珠的《大地》:“这本小说的每字每句都向我们展示着真实的中国人民。他们植根于土地,成长、成熟,正如书中所描绘的稻谷一样,从那翡翠般绿油油的种子中破壳而出,努力生长直到迎接那金色的丰收。”她还指出:“别人笔下的中国常常显得怪诞奇异,这本书中却看不到这种文字。”(1931:676)纳撒尼尔·佩弗(Nathaniel Peffer)在《大地》刚出版时所写的书评中明确指出:“这是一个以前的小说中从未出现过的中国,是一个中国人生活于其中并作为中国人而生活着的中国。……《大地》同真实的中国非常接近,即使你没在中国居住过,即使你对中国人一无所知,你也能理解它并被它吸引。”(1931: 1)

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 Isacs)充分肯定了赛珍珠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在所有喜爱中国人、试图为美国人描述并解释中国人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像赛珍珠那样卓有成效。没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比她那著名的小说《大地》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1999: 212)塞

① 参见 Nobelprize. org.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38. [2013-03-26].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38. 瑞典文学院的这句授奖词英文原文为:“for her rich and truly epic descriptions of peasant life in China”,对于它的翻译,曾有过不同看法。大多数学者采用的译文是“对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的、真实的、史诗般的描写”,然而复旦大学的唐海东(2010: 106)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应该翻译成“对中国农民生活丰富的、真正史诗性的描写”,笔者颇为同意。

瓦斯科(G. A. Cevalasco)认为:“在两百五十多位以中国为书写背景的西方小说家中,她(指赛珍珠——笔者注)在创作数量和创作质量上,无疑都是最出色的,……把所有以中国和中国人为书写背景的重要的英美小说放在一起,也比不上赛珍珠所取得的成就。”(1967:437—450)詹姆斯·格雷(James Grey)也提到过,他们那一代人中的许多人从学生时代起就认为中国是一个“存在于地平线之外的广阔却荒凉之处”,是一个“存在于可能性王国之外的地方,这个地方因为战争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至少不应算是世界四大力量中的一支”,而“赛珍珠通过她的中国题材作品帮助我们改变了固有的看法,使我们的心智朝着健全、同情和理解的方向发展”。(Gunton, 1981: 32)

以上这些赞誉,对于标示赛珍珠作品的独特价值、提升赛珍珠的影响力,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但在这些赞誉之外,来自各方的对赛珍珠的批评与诘难也从未中断过。这些批评与诘难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对赛珍珠作品文学价值的质疑。早在1930年《东风·西风》出版后,伊斯多尔·施耐德(Isidore Schneider)就评论其为“一部平庸、呆板的小说,充斥着刻意设计的情节和个人感情,在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这一主题下人物的塑造或意义都缺乏生命与活力”。(1930:24)《赛珍珠》的作者保罗·A.多伊尔(Paul A. Doyle)也评价《东风·西风》在写作手法上的确存在一些缺点,诸如“写作技法上呈现出过于雕琢和强调自我意识的风格”,“矫揉造作”,“不甚连贯、节奏缓慢”,“对一些无关紧要的描述着实显得多余”。(1991: 17)多伊尔很早就开始关注赛珍珠的创作数量庞大但却很少引起学界注意的短篇小说。他认为,诸如《结发妻》(*The First Wife*)、《雨天》(*The Rainy Day*)、《天使》(*The Angel*)等赛珍珠早期的短篇小说虽然体现了老式传统小说的写作特点,但多数是为了迎合热门杂志读者的口味而流于肤浅、失真和简单化。(Doyle, 1966: 62—68)在赛珍珠去世后的第二天,《泰晤士报》(*The Times*)上发布的讣告中评价道:“她的文学创作虽然引人瞩目,但恐怕还谈不上相当高的成就。”(7 Mar. 1973: 18)在美国《当代文

学批评》第11卷里,赛珍珠被认为是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作家,她的作品熟练描写和阐释了东方生活,但缺乏有力的艺术表现。(Gunton, 1981: 69)

其二是对赛珍珠所呈现的中国形象的真实性的批评。赛珍珠的《大地》甫一发表,美籍朝鲜作家康永熙(Younghill Kang)便率先发难。他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上撰文《中国决非如此》(*China Is Different*),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批评赛珍珠的代表作《大地》的失实。他认为赛珍珠在《大地》中编造的主人公王龙和阿兰的浪漫的爱情故事不可能发生在东方人身上。他批评赛珍珠“不了解儒家的男女有别及其各自领域的含义”,而书中所描写的王龙家庭中不良的性关系在儒家文化当中也根本不可能出现,甚至是“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的,这部小说“除了次要的细节之外,她所有重要的描述都毫无正确性可言”。(康永熙,1999: 574)^①比康永熙更为激烈的批评来自苏联人N. 谢尔盖耶娃,她在1950年发表了《破产的“中国通”——赛珍珠》一文,该文重点批判了赛珍珠《亲族》(*Kinfolk*, 1949, 即《同胞》)这部小说,认为该小说“极度无理地歪曲现实”,是“透过侵略性的美帝国主义的眼睛来看中国的”,试图“把阶级斗争和中国的政治生活从读者视线中掩盖起来”。她还认为赛珍珠根本看不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进步力量的存在,并企图“扭转历史的进展,使旧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复活”。(谢尔盖耶娃,1999: 576—581)耶鲁大学的中国史专家亨特(Michael Hunt)也曾于1977年在“中国学”研究期刊《现代中国》(*Modern China*)上发表文章,对赛珍珠的中国观做了批评。亨特认为,赛珍珠的中国观是建立在中国农业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上的,赛珍珠所呈现的只是一个简化了的中国图景,并没能对中国进行更为深入的阐释。同时,美国人民对美国在全球的独特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既有想法认可了美国在亚洲建立并扶持非共产主义的政府,而赛珍珠在二战前后对美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的批判妨碍了她在中美

①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康永熙这篇文章之后,《新共和》的编者附上了一段评论,认为此文对《大地》的批评“有失公允”,因为“没有人怀疑其(指《大地》)描述的准确性”。

关系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其三是对赛珍珠宗教观的批评。赛珍珠是传教士的女儿,她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从小就浸淫在基督教的氛围中。在她六岁时从中国镇江写给美国的《基督观察者》的信中就说到她的父亲是来“告诉中国人关于耶稣的事”,认为天堂是他们“真正的家”(彼德·康,1998:1)。然而赛珍珠在成年之后,却逐渐改变了对她父亲为之奋斗一生的传教事业的看法。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她竟然宣称相信《圣经》的信仰是在相信“一种神秘的宗教”,还认为西方派遣的传教士是“平凡而庸碌的人”。(杨昌溪,1999:43)这样的论调自然不容于基督教团体,于是她被基督教长老会国际宣教会开除了会籍。而且,在赛珍珠的代表作《大地》出版之后,虔诚的教徒们发现,书中并没有任何颂扬基督教教旨与福音的内容,中国人无论是求雨、祈丰,还是生子,均依靠他们自己传统神灵的庇佑,基督教对他们没有丝毫的影响,偶尔出现的传教士也是一个长相奇怪的洋人。虽然赛珍珠这样描写的意图是为了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来呈现中国人的看法,从而使作品更具真实性和客观性,但这却惹恼了保守派教徒,使他们对这部作品大加指责。纽约传教董事会负责中国事务的执行秘书长考特尼·芬恩(Courtenay Fenn)在看过《大地》之后就特意给赛珍珠写了一封信,坦诚地表示出对赛珍珠的“失望、伤心”,说“不想当众贬低大作”,并指责赛珍珠在《大地》中没有采用“传教士的视角”写中国,认为虔诚的传教士“不能光是因为作品‘忠于生活’就把它拿去出版”。(彼德·康,1998:146—147)此外,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也因赛珍珠对基督教的态度而对她的文学创作抱有成见。

其四是对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屑。在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美国只有辛克莱·刘易斯和尤金·奥尼尔两位男性作家获得过此奖,此二人无论在思想深度上还是在写作技巧上都代表了当时美国主流文学的高水平,获奖当之无愧。然而赛珍珠却是一个远离美国本土、远离美国主流文坛、依靠写中国人而成名的“通俗小说”作家,而且还是一个女人。不仅如此,她的获奖过程也极其顺利:“通过投票很快就选中赛珍珠,而没有像大多数候选人那样通常要反反复复考验很多年。”(宋安群,1999:305)因

此招致了一些当时已经功成名就,只差诺贝尔文学奖就可功德圆满的男性作家的不屑。大奖公布一天后,批评家诺曼·霍尔姆斯·皮尔森就抱怨道:“那个叫赛珍珠的女人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难道那些人想把这个奖搞得像普利策奖一样拙劣吗?幸好没见谁把这当回事儿,更没有取得奥尼尔获奖时铺天盖地的祝贺。赛女士唯一的评语好像是:‘我十分惊讶。’废话。故作姿态吧。”(彼德·康,1998:237)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也对赛珍珠大加嘲讽,公开说:“如果她(赛珍珠)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应成为问题。”(彼德·康,1998:237)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也曾对赛珍珠恶语中伤。1949年,当各大报纸热烈讨论他能否获奖时,他给朋友写信说:“我对诺贝尔奖的事一无所知,已经听到有关的谣传有三年了,有些胆战心惊。这种事情是无法回绝的,不能无缘无故地羞辱别人吧。但我不想要这个奖。我宁愿与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这样的人为伍,也不屑与辛克莱·刘易斯和中国通赛女士共荣。”(彼德·康,1998:237)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正是福克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也站在了十一年前赛珍珠站过的讲坛上,并发表演说称这讲坛是“令人瞩目的讲坛”(宋安群,1999:306),与他口中的“中国通赛女士”共荣了。

非但有以上的批评和诘难,美国的文学史界对赛珍珠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漠。至今在几部重要的美国文学史著作中,为赛珍珠所用的笔墨只有寥寥几句。当代美国著名的文学史家罗伯特·斯皮勒(Robert Spiller)等人编写的《美国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3)长达一千多页,对尤金·奥尼尔、威廉·福克纳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们的评论都达到了两页以上,然而却只用了短短两行半的文字评论了赛珍珠;由埃默里·埃利奥特(Emory Elliot)等人主编的一千多页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8)专章论述1910—1945年间的女性作家,其中虽有两处提及赛珍珠,但只是以此为例,“连一个完整的句子都舍不得花在她身上”(张子清,1999:183)。《美国文学宝库》(*A Treasu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955)、《美国文学传统》(*The*

American Tradition in Literature, 1956)、《诺顿美国诗文选读》(*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美国文学选读》(*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980)等颇具权威性的美国文学读本均没有收入赛珍珠一件作品,甚至对赛珍珠只字未提。(尚营林,1992:37)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中,很多曾经被男性评论家冷淡的女作家——如简·里德(Jane Leade, 1624—1704)和夏洛特·缪(Charlotte Mew, 1869—1928)等——都被挖掘出来重新评价,然而创造出众多出色的女性人物并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的赛珍珠却依然被忽视或遗忘。连《赛珍珠传》的作者彼得·康(Peter Conn)也在这部极具学术价值的传记的前言部分承认自己1989年出版的一部六百页厚的美国文学史,书中写到了自17世纪至20世纪的几乎每一个作家,但是根本没有提到赛珍珠。(1998:前言3)

赛珍珠及其作品遭到诟病和忽视是有一定原因的。在赛珍珠写作的年代,“现代派”已经成为西方文学的主流,因而评论家们用来衡量一部作品的标尺是诸如神话、原型、象征主义或者意识流等现代派小说的写作手法,而赛珍珠受中国传统小说影响颇深,注重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她的现实主义手法(她本人更倾向于认为是自然主义手法)自然就显得过时了。张子清认为,赛珍珠不受美国文学批评界重视的原因有四点:“未赶时髦去使用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多数作品是中国题材,而艺术形式是中国传统说书形式;她的作品不是含蓄、隐晦、艰涩、可供评论家不断挖掘的迷宫,而是群众喜闻乐见的畅销书;感情宣泄过度,说教成分过多。单纯追求情节的快速发展,忽视了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1999:184)彼得·康也指出:“她(赛珍珠)是大众作家,深受人民的欢迎,创作形式较为传统。基于这些事实,文学记者和学术评论家自然不会看重她的作品,因为他们对新作的取舍多以风格上的创新为基准。另外,赛珍珠是位女作家,主要表现女性的平凡生活,迷惘的一代及其倡导者对这种题材普遍缺乏热情。再者,她太把宗教问题当一回事,与大多数普通美国人没什么两样,这也使得她不为学术界所容。最后,她的作品以亚洲为题材,显得陌生、离奇,似乎仅以异国情调见长。”(1998:184)张子清和彼得·康的这些分析应该说还是比较到位的,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赛珍珠及其作品为什么长期遭到美国主流文学界与批评界的诟病和忽视。

(二)国内对赛珍珠的接受与研究述评

赛珍珠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中国为题材的,因此作品一经面世,便引起了中国译者的兴趣,并且很快出现了多种译本,如伍蠡甫、唐长儒、胡仲持、张万里等当时都翻译过赛珍珠的作品。与此同时,国内许多文艺期刊,如《文学》《矛盾月刊》《文艺月刊》等都用不同的版面和篇幅介绍并评价过赛珍珠其人其作。国内对赛珍珠的研究工作就是伴随着对她的作品的译介工作开始的。但是对这样一位终身致力于中国书写的美国女作家,国内学者的态度却是褒贬不一,且一度贬大于褒。^①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赛珍珠的作品就不断受到中国学者、作家的质疑和批判。这些质疑和批判主要集中在其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书写中国的真实性以及政治倾向性等几个方面。

对于赛珍珠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很多学者颇多微词。《大地》启明书局版的译者由稚吾就在《译者小引》中谈道:“平心而论,像这样一部作品在纯艺术的观点上,不应能博得这样的虚名。”(姚君伟,2008:55)朱雯以笔名“司马圣”发表的《我对〈爱国者〉的感想》一文,认为“赛珍珠的小说,平心说一句,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尤其是对于中国人和事的描写,简直浅薄得可笑。”(姚君伟,2008:55)祝秀侠撰文《布克夫人的〈大地〉——一本写给高等白种人的绅士太太们看的杰作》,大力鞭挞赛珍珠的《大地》,认为“我(祝秀侠本人)之所以反对布克夫人的态度,并不由于浅狭的民族观念,而正是反对她站在统治者的代言人的方面来麻醉中国大众,巧妙地来抹煞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残暴的实事。”(1999:58)胡风也在《〈大地〉里的中国》一文中提出了质疑:“这本书在欧美读者里面的惊人的成功,是由于她

^① 在20世纪30—40年代,仅清华大学教授叶公超、北京大学教授陈衡哲、著名出版家赵家璧以及著名学者庄心在和林语堂等少数人对赛珍珠的作品持肯定态度。他们的具体论述可参见郭英剑编的《赛珍珠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